论 21 世纪国际修辞学的发展趋势
——从布莱恩·维克斯与陈汝东的对话谈起

大卫·弗兰克
(美国俄勒冈大学)

摘　要: 2012 年 7 月,“21 世纪修辞学互动论坛”在英语世界的学术中心牛津大学召开。对话在西方修辞学界的学者布莱恩·维克斯爵士与东方修辞学界的学者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之间展开。两人关于 21 世纪国际修辞学的发展趋势以及修辞的目的与功能的对话成为论坛的亮点。对话反映了东西方文化观点上的对立与冲突,令学界注目。在本文中,作者探讨了该对话在促进理解中国、西方和普世修辞学方面的作用。这场高端对话表明了国际修辞学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学术交流促使西方学者放弃了“中国或东方无修辞学”的观点。正如陈汝东在其对维克斯的回应中所阐述的那样,中国修辞学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借鉴与合作提供了一种范式。中西方的修辞学的确在某些关键点上存在差异,但是,维克斯与陈汝东的对话表明,中国修辞学与西方修辞学可以实现和谐共处,这就需要他们从相互理解、欣赏和借鉴,以便为 21 世纪全球修辞学的发展做出实际贡献。

关键词: 牛津大学; 北京大学; 全球修辞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3)05-0134-08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和文明,与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文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演化轨迹。它们都历史悠久,各有千秋,同耀世界。正因如此,在世界文明发展中,两者时有接触、碰撞乃至融合。这也反映到了人文乃至社会科学领域,其中也包括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典型学科——修辞学。近年来,随着全球传播态势的形成,特别是国际学术交流频度的增加,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碰撞也在增加,与此同时也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对文明差异有了新的认识,文化和文明的融合出现了新的气象。这反映到了近年来的国际修辞学领域,体现到了东西方著名高校学者之间的对话中,比如牛津大学与北京大学两校学者之间关于未来国际修辞学发展趋势的直接对话。在此,笔者试图从东西方的学术对话中,窥探全球修辞学发展的未来趋向。

牛津大学是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她每年都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学术精英和学术领袖。北京大学是享誉中外的著名高等学府,她既具有中国古代的皇家血统,同时也融会了现代科学的朝气与活力。2012 年 7 月 3 日至 7 日,一场名为“21 世纪修辞学互动论坛”的学术盛举,在英伦学术圣地牛津大学举办,它把东西方的两座学术圣殿连接了起来。论坛由牛津大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主办,来自该中心的尼古拉斯·克洛博士与国际修辞学史学会的奠基者、西方修辞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荣誉教授杰姆斯·墨菲共同主持。

论坛组委会邀请了包括布莱恩·维克斯爵士、彼得·麦克、杰姆斯·墨菲、珍妮佛·理查兹等四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同时,论坛从世界各国众多的申请者中选拔出了 20 位学者代表参会。他们来自 8 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代表着不同的修辞学学术传统和学术主张。学者们济济一堂,围绕“21 世纪的修辞学”和四位主讲者的发言,就修辞学领域的各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对话和讨论。其中有主张、赞同,也有挑战和否决。尽管他们观点不一,但是,在修辞学能为 21 世纪的人

收稿日期: 2013-07-12

作者简介: 大卫·弗兰克(David A. Frank),男,美国人,美国俄勒冈大学罗伯特·柯拉克荣誉学院院长、修辞学教授。

类发展提供思想和方法方面,所有与会代表的看法是趋于一致的。当然,会议也反映了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偏见和傲慢,那就是大部分立论是基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学传统,其中西塞罗的《论雄辩家》等文献被提及的频率最高。

在本届论坛所邀请的东西方著名学者中,英国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者最引人注目。发生在西方修辞学的领军人物布莱恩·维克斯爵士和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之间的对话,成为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陈汝东教授现任全球修辞学会长,曾担任世界汉语修辞学会会长和国际修辞学史学会的理事。陈教授在当代修辞学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卓有建树,他在社会心理修辞学、认知修辞学、语言伦理学、修辞传播学等诸多领域独树一帜,可称得上是中国和东亚修辞学界的领军人物。下面,笔者将通过记述维克斯和陈汝东之间的对话,探讨东西方修辞学的冲突、对立,揭示当今修辞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作为西方修辞学的领军人物之一,维克斯教授因其在修辞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爵位。其著作《捍卫修辞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修辞学著作之一。① 在主题发言中,维克斯主张,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应该沿袭上世纪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重点加强以下三个领域的研究。

首先,他主张,应加强对修辞学文献的翻译,并把它们放置在其所产生的语境中予以语篇分析。这方面有些著作很值得借鉴,比如弗吉尼亚·考克斯与约翰·奥斯特拉·沃德合著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早期评注传统中的西塞罗修辞学》、詹姆斯·墨菲与劳伦斯·葛林合著的《文艺复兴修辞学概要(1460—1700)》、格特·游町、格雷戈尔·卡里沃达和弗朗茨·罗柏林三人共著的《修辞学史辞典》,该书共七卷,全面探讨了德国的修辞学。②

其次,维克斯呼吁要把修辞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表现形态来研究。修辞学者应考量修辞学理论是如何代代相传的。因此,他强调,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持续关注研究修辞学教学问题。

第三,修辞应被作为政治活动的一种形态来研究。维克斯十分关注修辞学在政治舞台上所起的作用:在民主国家里,并非好人和拥有出色的修辞技能,就总能取得良好的修辞效果,就能总在舆论中占上风。他倡导修辞学者要着力研究以下问题:修辞“说服”功能的发生机制是什么?说服是怎样发生的?这些问题可能会为本世纪的修辞学者指明研究方向。维克斯同时不无遗憾地表示,美国和英国的国家政治修辞是很糟糕的,显然,他们迫切需要更为恰当的政治话语。

作为唯一来自亚洲大学的学者,陈汝东教授应邀对维克斯的发言作了点评和回应。在简要准确地概括了维克斯所阐述的要点后,他表示,对人类古典修辞学思想的阐发应兼顾多元文化背景,应有东西、南北视野,既关注古希腊、古罗马的修辞学传统,还应关照东方的修辞学传统,关注非洲的修辞学传统,特别是东方的儒家修辞学传统。陈教授指出,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应从古希腊走出来,走向英国、德国……走向亚洲,走向全球;修辞学者应胸怀当下的全球修辞现实,既要从古典文献中汲取营养,同时还应着眼未来的理论创新。西方学者需要从古典传统和现代表达两个层面去认识和发现中国修辞学。

陈汝东回顾说,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修辞立其诚”(《周易·乾·文言》)的重要观点,同时提出了“言礼”、“言仁”、“言忠”、“言信”等四项修辞原则。③ 所谓“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言谈者,仁之文也。”(《礼记·儒行》)所有这些都强调了修辞的社会道德功能。这种重视修辞伦理的传统,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所倡导的“真”的修辞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修辞必须遵

① Brian Vickers, *In Defence of Rhetor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Virginia Cox and John O. Ward, *The Rhetoric of Cicero in Its Medieval and Early Renaissance Commentary Tradition*, Leiden, Boston: Brill, 2006. Lawrence D. Green and James J. Murphy, *Renaissance Rhetoric Short – Title Catalogue* 1460—1700, 2nd ed., Aldershot,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6. Gert Ueding, Gregor Kalivoda, and Franz-Hubert Robling, *Historisches Wèorterbuch Der Rhetorik*, Tèubingen: M. Niemeyer, 1992.

③ 陈汝东:《论汉民族先秦时期的言语道德思想》,《语文建设》1997年第6期。

守道德规范,必须以仁爱为至善目标。孔子的“言仁”思想对解决全球化中的世界冲突,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汝东指出,说服、论辩、生产知识、发现真理,是西方古典修辞学的核心。中国古代也有论辩修辞,有苏秦、张仪等纵横之士,也有专讲论辩的著作《鬼谷子》。这表明修辞在不同文化和文明中具有普遍性。东西方的修辞学应该兼容并包。西方学者应平等地看待并吸纳东方特别是中国修辞学中的智慧。他认为,修辞不仅是论辩、演说、说服,更是一种“人类生活方式”、一种“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人类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陈教授最后总结说,21 世纪的修辞学,应立足全球传播,通过修辞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气候以及各种利益冲突问题。修辞应成为避免和替代暴力和战争的和平手段,给不同文明提供通过道德沟通处理重大问题的机会和途径。陈教授的这些观点恰恰是维克斯主题发言中没有提及的。

维克斯爵士关于西方修辞学传统的观点全面、准确,但是缺乏陈汝东教授的洞察力——21 世纪的修辞学将不再专属于英国或西方。西方的修辞学者应充分感激亚洲学者所阐发的亚洲修辞学传统。在回应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修辞学者时,陈汝东建构了一种东西方修辞学者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应有和可行模式。他在尊重并准确地理解维克斯观点的基础上,巧妙地引申和阐发了中国的修辞学传统,弥补了维克斯对中国修辞学传统和学术缺乏认知的遗憾。

维克斯的主题发言未能反映出他对东亚修辞学传统的理解或尊重,这是令人遗憾的。集全球学者智慧编纂而成的巨著《国际传播学百科全书》,是理解修辞学和传播学的一部最重要的全球性学术工具书。数年前,陈汝东就应邀为该书撰写了“东亚修辞学:中国和日本”①词条。他在其中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东方的修辞学思想,彻底破除了某些西方修辞学者关于亚洲无修辞学的幻象”,并为比较修辞学研究奠定了六条原则。② 他指出,中国的修辞学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这远远早于古希腊的修辞学。在中国,古代修辞有道德修养、人生追求、人际协调、社会管理等四项功能,修辞能力和说服行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教授认为,中国古代人遵循“礼”、“仁”、“忠”、“信”四项修辞原则,强调“文”、“质”、“达”、“巧”等切合语境的具体技巧。③

不言而喻,陈教授所概括出的中国古代的修辞功能和原则,依然对现代修辞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可以被用于解决中国当代所面临的修辞问题。他所提出的许多修辞理论观点中就融会了中国古代的修辞思想,包括社会心理修辞学、语言伦理学等。近年来,他审时度势地及时提出了国家修辞、国家传播和国家话语问题,这显示了他的机智。目前他已在该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陈汝东还梳理了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当代修辞学的一些新成果,包括王德春、陈晨的《现代修辞学》、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黎运汉的《汉语风格学》、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刘焕辉《修辞学纲要》、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以及他本人的《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认知修辞学》等。这很大程度上便于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当代修辞学的发展情况。

近年,在新著《新兴修辞传播学理论》中,陈汝东全面阐述了修辞学与传播学等相互交叉形成的新兴学科,探讨了国际修辞学的理论前沿问题,剖析了语言、图像、媒体、视觉、公共演说等在意义生产中的作用机理。他的著作言简意赅,向国内外读者勾勒了中国当代修辞学发展的路线图。陈教授曾经在英美学习、研修过,因而他能清楚地发

① Chen Rudong, “Rhetoric in East Asia: China and Japa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Wolfgang Donsbach, Malder, 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 pp. 4228 –4231.

② 大卫·弗兰克:《问题修辞和修辞问题:建构全球修辞学》,《江淮论坛》2012 年第 3 期。

③ Chen Rudong, “Rhetoric in East Asia: China and Japa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Wolfgang Donsbach, Malder, 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pp. 4228 –4231.

现中国修辞学和西方修辞学的异同。他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修辞问题”①,因为它不仅关涉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更关涉国家权力体系和公共政策的建构方式,关涉公共意志的凝聚和体现方式,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国家传播的质量、效率。这些观点理应成为与维克斯教授对话中的高潮和核心部分。

在此次牛津会议最后的议会辩论环节,学者们就 21 世纪修辞学的发展问题和如何为搭建东西方交流之桥进行了辩论。有一组学者提议,对古代修辞学文献的翻译,应成为 21 世纪修辞学研究的基础。他们认为,文献翻译实现了意义在不同文化中的传播,也促进了全球修辞文化的发展。此外,翻译需要灵活性,需要关注受众伦理,需要对受众道德的认知;而对意义丰富文本的翻译,还需要创造性。该小组的学者们认为,说服(修辞)过程本身植根于翻译中,说服首先源于思想和灵魂,然后转变成口头的、视觉的或书面的表达形式。如果这一观点有价值,那么,修辞学者们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把亚洲的修辞学文献译介到英语世界,同时把英语世界的修辞学文献译介到亚洲。

与陈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问题是修辞问题”观点相似,在牛津会议上,第二小组的学者们认为,21 世纪的修辞学应成为消除误解和曲解的有效手段,而不是引发误解和曲解的祸根。在修辞伦理方面,他们主张采取积极的对话姿态,以受众为中心建构有道德的社会。全球受众形形色色,因此,修辞形态也应多种多样。理解修辞学历史,必须理解基于不同受众的表达方式,必须根植于对修辞多样性的认知。

维克斯爵士和陈汝东教授之间的对话,凸显了西方需要认知东方修辞学的迫切性,这是完善西方修辞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时告诉我们,需全面把握区域修辞和全球修辞,以发现它们的异同,并像陈教授所阐述那样,通过基于修辞的国际对话而不是武力来解决分歧。此次牛津论坛,特别是布莱恩·维克斯爵士和陈汝东教授之间的对话表明,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修辞学者可以对话、辩论,并建构一个基于孔子和西塞罗修辞学思想原则的全球学术共同体,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在仁川举办的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第三届年会上,陈汝东教授作了题为《论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的大会报告。② 在报告中,陈教授描绘了国家修辞学、区域修辞学如何融汇成全球修辞学的路线图。他呼吁各国学者正确处理好国家修辞学与全球修辞学的关系。“国家修辞,就是以国家为修辞主体,以建构国家形象、处理国家事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为目的的修辞行为和现象。”③国家修辞(比如中国和美国),能利用神话虚构和逻辑推理来建构各自独特的国家身份以及对其他国家的看法。而国家修辞学,则是“研究国家修辞现象、修辞手段、修辞策略,揭示国家修辞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④。陈教授主张,国家修辞学是当前国际修辞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它将成为全球修辞学银河系中的重要一员。各国修辞学者不仅应推广本国修辞学,同时应比较、分析其他国家的修辞学,以推动普世修辞学的建设。比较也会引起一些冲突和对抗,但是这些可以通过修辞学来解决。陈教授的观点令人振奋,这必将促进全球修辞文化的巨大发展。

陈汝东教授致力于倡导国家修辞研究,寻求通过修辞改善国家形象的方法。他着力探讨了“国家形象构建、国家修辞能力和策略提高,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以及公众的国家修辞能力”的提高问题。陈教授写道,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向全世界展示全球背景下的国家修辞

① David A. Frank, “The Problem of Rhetoric and the Rhetoric of Problems: Developing a Global Rhetoric”,《国际修辞学研究》,第二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 页。

② 陈汝东:《论全球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第三届年会特邀大会报告,韩国仁川大学 2012 年 10 月 27 日。

③ 陈汝东:《国家修辞:实现国家话语转型的新基石》,《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201 期,2011 年 6 月 30 日,第 28 版。

④ 陈汝东:《论国家话语能力》,《北京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

能力。他认为,“国家修辞能力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政府官员、民众、媒体通过修辞处理国际、国内事务所表现出的能力,它包括政府领导人的国家修辞能力、外交部门的国家修辞能力、媒体的国家修辞能力和过您的国家修辞能力等。国家修辞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①。陈教授对“国家修辞能力”的阐释视野广阔,必将有助于中国国家传播实力的提高和国家形象的改善。为实现这一目标,陈教授积极地和其他国家的学者一道创造学术交流机会,从而使中国和西方的修辞学者能共聚一堂,探讨共同关心的话题。

陈教授认为,国家修辞主体都应具有国家身份意识。在笔者看来,就是要强调中国人的独特身份意识,特别是具有民族特点的神话传说身份,即“龙的传人”。体现在国家修辞中,用陈教授的话说,就是“龙的传人要讲好龙的故事”,避免中国形象“被妖魔化”。② 陈教授坚持认为,中国的国家修辞学研究,应强调中国的古典修辞学传统,尤其是“仁爱”和“纵横说服”传统。与古希腊一样,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中国,也有演说、论辩、说服的传统,中国无须从西方引进修辞思想。

国家修辞理论,特别是国别受众分析理论,不只是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即使对美国的国家修辞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就都需要充分认知中国的神话传说,了解他们是如何进行沟通对话的。奥巴马总统任命洪博培为其第一个任期内的美国驻华大使,这反映出美国的一种承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理解中国文化基础上的,对此笔者深信不疑。洪博培通晓中国历史,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尽管中美之间有摩擦,但是,受洪博培的影响,奥巴马政府一致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同样,中国当代外交政策的目的,就是树立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国家形象,因为中国和美国一样,是全球最有实力的处于领袖地位的大国之一。为此,中国学者目前正在推进公共外交政策研究,寻求发展“说服软实力”,以改善中国国家形象。

2000 年,美国的修辞学者艾伦·葛络斯应邀来华访问,并与中国修辞学者建立了深厚友谊。此后,中国修辞学界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不断增加,逐渐被国际修辞学界所承认。2007 年,由陈汝东教授联合东亚和各国华裔学者倡导发起的世界汉语修辞学会在法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修辞学登上了国际学术舞台,并成为一支生力军。在陈教授的领导下,学会迅速壮大,它不仅把大批的亚洲学者团结到了中国学者周围,而且把世界各国的众多学者吸引到了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丹麦、瑞典、墨西哥、埃及、南非、保加利亚、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数十个国家的学者都申请加入了学会,并积极参加学会的年会等学术活动。

作为其中的一名来自美洲的会员,笔者深信,全球修辞学会、世界汉语修辞学会通过修辞学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文化,了解了中国神话。中国的修辞学研究者、教育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美国修辞学者对中国的修辞传统尚不了解。詹姆斯·墨菲曾于1972 年撰文说,没有证据证明西方之外有修辞学。③ 现在,我想,他应该对中国的修辞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中西修辞学者之间缺乏接触交流。西方学者固执地认为情感、直觉和神秘是东方最重要的文化价值所在,认为东方人缺乏论辩理性。而世界汉语修辞学会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中都不缺少理性。这些成果匡正了西方学者的误解和偏见。

维克斯爵士与陈汝东教授之间的对话表明,修辞学研究在进步,不同的修辞学传统可以并驾齐驱。这将会成为全球修辞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这也是陈教授和其他国际学者着力去努力的方向。维克斯和陈汝东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对全球修辞学感兴趣的学者应阅读基础性的全球修辞学文献。当然,维克斯会推介柏拉图和西塞罗的著作,陈教授则会推荐阅读孔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正如维克斯在主题发言中所说,要保证西方

① 陈汝东:《新兴修辞传播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5、176 页。

② 黄金鲁克:《国家形象塑造: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教育报》2012 年 1 月 16 日,第 4 版。

③ James J. Murphy, *A Synoptic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Random House, 1972.

修辞学文献从古希腊语、英语翻译成汉语,并辅之以中国读者或其他亚洲读者所需的评注。与此相应,汉语修辞学文献也应在熟知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学者协助下翻译成英文。①

然而,只是让不同的修辞学传统并驾齐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方法仅仅是对不同的修辞学观点进行比较阐发。陈教授还呼吁不同修辞学传统之间的"碰撞",使不同修辞学传统在某些话题上得以共享成为可能。比如,笔者与韩国朴禹洙教授合作对美国修辞学教授罗伯特·奥利弗进行了研究。奥利弗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修辞学教授,曾为韩国第一位总统李承晚捉刀代笔。我们的目的是探讨李承晚与罗伯特·奥利弗教授之间长达18 年的合作情况。我们认为,美国文化与韩国文化在他们的合作中相互"碰撞",他们在"碰撞"中达成了共识。

陈教授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对修辞学文献和修辞学传统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描述层面。我们必须如陈教授在牛津论坛上所做的那样,鉴别出分歧和对立所在。维克斯与陈汝东的牛津对话彰显了一个重要区别:维克斯的修辞学观点源于柏拉图,集中在真理和论辩,而陈汝东富有影响力的前瞻性观点则集中在"仁爱"等伦理道德上。两位学者对话所昭示的深远意义将在于:正如陈教授言简意赅地指出的那样,中国修辞学同样重视真理与说服,维克斯也将会认识到,古希腊修辞学也确实关涉伦理道德。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得承认,古希腊的修辞学体系和中国的古典修辞学体系之间存在差异。

凭借论辩理性,修辞学者们就可以通过理性对话来解决这些差异。如此,修辞学者们将能参与到真正的全球修辞学研究中。他们既是所在国家的公民,也是不断超越国家价值观的世界公民,全球修辞与他们都有关。在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第三届年会的报告中,陈汝东呼吁通过修辞建立一个全球大同世界。在这个全球大同世界里,人们用论辩而不是武力、暴力来解决分歧。有些修辞学文献是有助于全球大同世界建立的,比如哈伊姆·佩雷尔曼和露西·奥布莱茨 - 泰特卡的《新修辞学:论辩文集》。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谋杀了。在此背景下,佩雷尔曼和泰特卡在该书中提出,应把修辞作为人类通过理性论辩来解决分歧的一种手段。他们试图寻找通过推理(逻辑)来说服受众,解决分歧。如陈教授一样,他们也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对话来达成一致。

佩雷尔曼和泰特卡也提出过"全球受众"的想法,而陈教授也有这样的提法,只是措辞不同。全球受众与地区受众、国家受众有关联。在呼吁建立一个以修辞为基础的大同世界时,就如佩雷尔曼和泰特卡所说的那样,陈汝东教授试图建立一套普遍的公平正义原则,以帮助判定舆论和政策上的分歧。而上述原则本身就是深思熟虑劝说的结果。当然,有些问题可能并不面向说服,但是,在修辞学的银河系中,即使观点存在根本性分歧,也是存在共处空间的。

在中国推进真正的修辞学文化建设,努力推行修辞思维,这是陈汝东教授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他不断与亚洲之外的学者进行接触、对话和交流,借鉴东西方的修辞学传统。我愿与他共同努力。正如陈教授所说,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一样,都是修辞,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正是修辞。

(张倩译　日本札幌大学)

① For examples, see Xing Lu and David A. Frank,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Rhetoric/Bian",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 No. 4 (1993): 445 - 463; Xing Lu, "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 Fifth to Third Century, B. C. E. : A Comparison with Classical Greek Rhetoric", *Studies in Rhetoric/Communic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② Chaïm Perelman and Lucie Olbrechts - Tyteca, *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9; David A. Frank, "A Traumatic Reading of Twentieth-Century Rhetorical Theory: The Belgian Holocaust, Malines, Perelman, and De Ma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93(2007): 308—343.

World Rhetoric in the 21st Century: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ir Brian Vickers and Chen Rudong

David A. Frank

(*University of Oregon*, *U. S. A.*)

Abstract: The "Rhetoric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Interactive Symposium" (3 – 7 July, 2012) hosted a group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f rhetoric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exchange between Sir Brian Vickers, a leading scholar of rhetoric in the West, and Professor Chen Rudong of Peking University, President of the Global Rhetoric Society of the World, and the leading rhetoric scholar in China, on the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rhetoric studies and the purposes and functions of rhetoric was a highlight of the Symposium. The dialogue reflects the contrasting and conflict on cultural perspective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It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rhetoric studi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onsiders the Vickers-Chen exchange and how it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Western, and cosmopolitan expressions of rhetoric. Toward this goal, the issues raised by the top dialogue of Vickers-Chen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on the topic of rhetoric. These exchanges have encouraged Western scholars of rhetoric to abandon the view that there was no rhetorical tradition in China or in the East. As Chen revealed in his response to Vickers, Chinese rhetoric can offer a paradigm for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While Chinese and Western rhetorics do differ on important key points, the Vickers-Chen exchange demonstrates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 rhetorics can be brought into harmony through a cosmopolitan comprehension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strengths they both br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truly global rhetoric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Oxford, Peking University, Brian Vickers, Chen Rudong, global rhetoric

(责任编辑　　何　方)